

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

李商隐诗歌赏析

曹淑智 选析

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

李商隐诗歌赏析

曹淑智 选析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

李商隐诗歌赏析

曹淑智 选析



育出版社出版

(民族大道 68 号)

南宁华侨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5 80 千字

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 册

ISBN 7—5435—1922—4/I·179 定价:2.10 元

(桂)新登字 05 号

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》序

秦 仁

两年多前，广西人民出版社筹划编辑一部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》，委托梁超然、陈光坚副教授和我选定题材，并负责部分审订工作。这是一套有计划选题，有统一编写体例的丛书，主要的读者对象是中学生和自学青年、自学干部，从今年起陆续出版，预定三年内出完。

我们知道，我国文学的发展，源远流长。就有文字记载的来说，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周代的民歌选集——《诗经》。稍后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，开始有了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。我们说我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，文学便是其中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。

文学的内容和形式，都是不断地发展的。到了汉魏六朝，不但民歌更普遍地发展起来了，而且作为文学家的诗人，也愈来愈多了。散文方面，从先秦的神话、寓言故事、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，发展为形式更加丰富多样，作家林立的局面。我们只要从六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《文选》一书，就可以看到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概貌。文学批评家刘勰说：“详夫汉来杂文，名号多品”，就是指的文学式样有了很大的发展。他说的“杂文”，

实际上是汉代以来好几十种新发展起来的文体的总称。

到了唐代，不但诗歌方面出现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新高峰，散文方面也有许多有名的作家，而且，不少作家是韵文和散文兼长的。这时候，短篇小说也开始出现了。

我们平时说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这是唐以后韵文方面新的发展的主要脉络，并非说唐代只有诗，宋代只有词，元代只有曲。散文方面，到了宋代，开始产生白话小说。宋、元、明几代，白话小说（称之为话本）一直在发展，并从而产生了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长篇小说，而以清代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达到了小说艺术的高峰。

戏剧这一文学形式，是从宋元时代才开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。元代戏剧有许多优秀的作品。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国戏剧的出现虽然比西方晚，但它的发展之迅速和普及之广泛，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匹的。从元代到明、清两代，戏剧发展为千百种的地方戏，广大人民包括人数众多、文化水平低的农民，都是戏剧的观众，这实在是一个奇迹。在西欧，直到今天，还没有能使戏剧普及到农民。在我国各种地方戏兴起的过程中，还产生了不少由群众中不知名的作者写的优秀剧本。这个现象，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

由此可以看见，我国的文学发展，从来就是循着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两个方面交互进行的。这两个方面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。无论诗歌、话本小说、戏剧，都是先从民间产生，但又都为各个时代的文学家吸取作为营养和蓝本，使之发展为更加完美的作品。

编辑出版这一套丛书的目的，就在于沿着我国文学发展

史的脉络,把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家和主要作品介绍给年青一代的读者。这样,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概况,看到各个时代的一些精品——优秀的文学作品,这不但对于提高文化水平和阅读能力,培养对文学的欣赏情趣是有帮助的,而且,对批判地继承我们的文化遗产,培养爱国主义的思想情操,也将是有帮助的。

为了适应读者对象,每本书在注释方面力求做到准确和详细,难点尤其要讲清楚,不避重就轻。韵文一般不译成白话,但《诗经》比较难懂,因此《诗经赏析》的各篇都译成白话。为了帮助读者对作品的理解,每一本书都采用了“赏析”的体例,我们要求“赏析”写得深入浅出,对于每篇作品的思想艺术性、写作技巧,能抓住要点,给予适当的评论,并从欣赏的角度谈出一点可供读者参考的意见。赏析的写法同教科书的分析有所不同,不是面面俱到,而是根据不同的作家和作品,谈具有特色之处,这样,也就是不千篇一律,而是比较生动活泼的、比较丰富多样的写法了。

我们希望,这一套丛书能引起青年们对文学的广泛兴趣,并使他们从这套丛书中,得到对我国古代文学虽是初步的,然而却是广泛的接触,打下更坚实的语文基础。

1985年2月11日

前 言

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到晚唐，同衰败没落的唐王朝一样，也开始走下坡路。由于相继出现了以杜牧、李商隐、温庭筠和韩偓等为代表的作家，为已发展了三百多年的唐诗，映现出“夕阳无限好”的晚景，形成唐诗发展过程中最后一个高峰。其中李商隐又以其独具的风格，活跃在风雨如晦的诗坛上，开创了朦胧情思朦胧境界，成为晚唐诗人中成就最高的诗人，为唐诗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，获得了后世读者的广泛赞誉。

李商隐，字义山，号玉溪生，又称樊南生，怀州河内（今河南沁阳）人，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（813），死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（858），终年46岁。

李商隐出生于一个低级官吏家庭。他两岁时便随父到浙江，父亲李嗣先后6年依附于越州、润州两州刺史，直到九岁父亲病故于浙江幕府，他才陪同母亲返回郑州。低级幕僚的家境本来就不富裕，加上他兄弟姊妹众多，父亲一死，生计更加艰难。后来他在《祭裴氏姊文》中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：“四海无可归之地，九族无可倚之亲。”孤儿寡母的可怜处境，概可想见。3年后举家移居东都洛阳，他不得不以“佣书贩舂”来养家糊口。所谓“佣书”，即为人家抄书。这是他在人生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，也是十分艰辛的一步。这种境遇，使他较早地体察社会人生，使他早熟，也促使他从少年时起便刻苦读书，所谓

“五年读经书，七年弄笔砚”，为了将来猎取功名、出人头地。在洛阳期间，他的一位儒学根底深厚、为人耿介的堂叔对他影响极大，不仅对他思想品格的形成和处世为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，还“亲授经典，教为文章”，使他在少年时便能写出水平不低的古文，所谓“十六著《才论》、《圣论》，以古文出诸公间”（《樊南甲集序》）。在洛阳，少年李商隐的古文已小有名气了。

唐文宗大和三年（829）三月，令狐楚到洛阳任东都留守，兼东畿汝都防御史，得知李商隐的文名，便聘请他入幕为巡官。这年他17岁。此后七、八年，除短时期离开此地外，一直跟随令狐楚。这七、八年，是李商隐从少年到青年，也是他步入仕途后的成长时期，令狐楚是引导他成长并走上成材之路的关键人物。令狐楚是进士出身的将领，文才武略兼备。文有“才思俊丽”的美称，是著名的今体（骈体文）奏章大家；武，则“风仪严重，若不可犯”，是有胆识有威严的将领。李商隐入幕后即得到他的赏识，破格优待，要他与自己的儿子令狐绹一起攻读，并亲自传授骈体文奏章的作法技巧。在令狐楚的精心培育教诲下，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飞快，很快就成为写骈体文的高手。李商隐的这种进步，除了令狐楚这位名师指点的因素外，一种内在的迫切需求也是十分重要的，也就是说，职责需要和兴趣爱好，把他的全部精力引向骈体文。幕府巡官的职事是草拟奏章，而奏章是用时兴的“四六”文写的，生活要求他必须精于此道，否则便无法立足。骈体文富于文艺气息，古文重在思辩意识，李商隐的兴趣爱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。或许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，研习骈体文的经历，却成了转变和影响其日后的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。李商隐诗歌的繁辞丽语、精工幽微

以及蕴藉朦胧等重要艺术特点，都能从骈体文中寻到踪迹。

令狐楚后调任天平军(驻郢州)节度使，李商隐随之前往。大和六年(832)李商隐20岁时，在令狐楚的资助下去长安参加进士考试，未中。李商隐走后，令狐楚又驻节太原。大和七年(833)春闱，李商隐因病未赴试。这年6月，令狐楚调京任检校右仆射，兼吏部尚书，李商隐辞去幕职，赴华州(今陕西华县)投奔任华州刺史的表叔崔戎。大和八年(834)春，李商隐从华州赴京应试，又不中。落第后回华州，崔戎已调往兖州(今山东兖州西)任观察使，李商隐又至兖州幕府，掌文书奏章。崔戎到兖州不久即暴病而死，李商隐再次失去依托。这年11月，发生了震惊朝野的“甘露之变”，宦官仇士良逐杀大批朝臣，京城陷于一片恐怖之中。在时局动乱，仕进遭挫的情况下，李商隐到济源县(今河南济源市)境内的玉阳山学道去了。

佛教与道教在隋唐都极盛行，道教势力又更大，它是唐朝的国教。中晚唐时的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诸帝，都信方士、服金丹，道士真人倍受推崇，当时的政坛显要，文场巨子，不少人与道教有关连。落第举子、失意文人仕途受挫时，也往往短时遁入道观中，等待时机到来，有如“终南捷径”。李商隐到玉阳山学道，大概也属于这种情形。这一段生活，对形成李商隐诗歌朦胧情思、朦胧境界的艺术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大和九年(835)，他离开玉阳山，回郑州老家。第二年，从郑州奉母移居济源城居住。

唐文宗开成二年(837)，李商隐再次赴京应试，居然考中，这一年他25岁。对李商隐终于考中进士，历来的评论者都说是令狐绹举荐的结果，这是由《新唐书·李商隐传》来的。《传》

中说：“开成二年，高锴知贡举，令狐绹雅善锴，奖誉甚力，故擢进士第。”而比《新唐书》早一百多年的《旧唐书·李商隐传》则说：“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。”只字未提令狐绹出面说情的事。这两种记载，哪个更接近事实呢？还是看看李商隐自己对这件事的记述吧，他说：

自大和七年后，虽尚应举，除吉凶书及人凭倩作笺、启、铭、表之外，不复作文。文尚不复作，况复能学人行卷耶？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，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。既得引试，会故人夏口主举人，时素重令狐贤明，一日见之于朝，揖曰：“八郎之友，谁最善？”绹直进曰：“李商隐。”三道而退，亦不为荐托之辞，……

（《与陶进士书》）

这件事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：令狐绹只对主考高锴说过与李商隐友善，并无荐托之辞。前两次应试，李商隐也没有像世俗人士那样“行卷”（亦称“温卷”，即考前投文名人，挽请揄扬关照），他说：“未曾衣袖文章，谒人求知。”（《上崔华州书》）更没有借助令狐楚权臣之势的援引（他有条件请求令狐楚帮助）。可见他考中进士，是全凭自己的本领。博取功名，是仕途命运攸关的大事，李商隐却处之坦然，确能显示出其高尚正直的品格。而《新唐书》的这一记载，却成了后来牛党人物攻击李商隐“背恩”、“放利偷合”的口实，也为对李商隐的研究制造了混乱。

开成二年（837），李商隐带着新进士的喜悦来到令狐楚的兴元节度使幕府。不幸，这年冬天，令狐楚卒于兴元任上。开成三年（838），李商隐 26 岁，应泾原节度使（驻甘肃泾县北）王茂

元之聘为幕僚。王茂元爱其才，把女儿嫁给他。《唐摭言》称“进士宴曲江日，公卿家倾城纵观，中东床选者，十八九。”达官贵人择新进士为婿是时尚。李商隐入选为王家女婿本来是一件极平常的事，然而万万没料到，这段婚姻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无穷的烦恼与不幸。晚唐时，牛李两党互相倾轧，持续四十余年，在唐文宗时，两党相争更是激烈。令狐楚父子属牛党，王茂元属李党。李商隐成为王家女婿后，牛党的令狐绹等人对他甚是忌恨，骂他“背恩”，牛党当权人物对他进行打击。李商隐到王茂元处不久，参加了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科考试，先为考官所取，复审时，朝中某“中书长者言：‘此人不堪’”，他的名字就被删去。唐朝制度，考中进士谓之及第，还不能做官，再经宏词或书判等科考试考中的，谓之登科，才能授官。开成四年（839），李商隐27岁时，经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后被录用为秘书省校书郎的正式官职。不久，被排挤出京师，外任虢州弘农县尉。县尉是位在县令、县丞和主簿之下，主管催租征税、判狱缉盗之类的官，显然不是李商隐所愿为的官职。后来与上司观察使孙简不合，一气之下，离职而去，直到诗人姚合来取代孙简职务后才回来。开成五年（840）冬，辞去县尉之职。一度暂居于华州刺史周墀幕下，又到许州，在岳父王茂元幕府为掌书记，过着寄人篱下、劳形案牍的幕僚生涯。唐武宗继位，改元会昌，李德裕为宰相，一时朝政颇有改观。于是李商隐于会昌二年（842）又一次参加吏部的考试，以书判拔萃，被委派为秘书省正字官。诗人眼前又展现出光明的仕进前景。然而好事多磨，这年冬，母亲病逝（转年九月，岳父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死于任所），不得不回乡服丧三年。会昌五年（854）10月，重返秘书省任职。

第二年3月，唐武宗因服用丹药过量而死。

宣宗继位后，朝政发生了急剧变化。武宗死后仅一个月，李德裕便被贬为荆南节度使，与李德裕政见相同的朝臣非贬即流；武宗时被贬逐的牛僧孺、李宗闵等五宰相被召回京，任命牛党的白敏中、令狐绹为相。与李德裕相善的给事中郑亚贬为桂州刺史、桂管防御观察使，由三品朝官贬为边地州城的守宰。大中元年(847)，35岁的李商隐应郑亚之聘为幕府掌书记(从六品上阶)，五月，随郑亚抵桂林。到桂林后，当年十月，奉命到南郡(今湖北江陵)晋见郑亚的从叔荆南节度使郑肃，大中二年(848)回桂林。在这次旅途中，他编完他的骈文集《樊南甲集》。二月，郑亚又被贬降为循州长史。当时李商隐在昭州(今广西平乐县)，以幕职摄守郡事，他回桂林与郑亚分别后买棹北归。北归后，先后任周至县尉、京兆尹法曹参军等职。大中三年(849)十月，他的老友武宁军节度使(治所在今徐州市)卢弘正请他入幕为节度判官，并领六品下阶的侍御史官衔，第二年春抵徐州。到徐州仅一年多，大中五年(851)春，卢弘正死于任上。春末，诗人由徐州回到长安家中。不久，被补为太学博士，是个六品衔的闲官。国子监的无聊生活令诗人沮丧，而更为不幸的是这年的夏秋之交，爱妻王氏夫人去世。李商隐最为难解的一些《无题》诗，大多写于此时前后。

大中五年(851)七月，李商隐应东川节度使(治所在梓州，今四川三台县)柳仲郢之请为掌书记(后改为节度判官，并加爵为检校工部郎中)。此后几年，他一直在四川。大中七年(853)编完他的《樊南乙集》，自序说：“三年已来，丧失家道，平居忽忽不乐，始克意佛事，方愿打钟扫地，为清凉山行者。”长

年的苦闷生活，他想从佛学中求得解脱了。大中九年（855）十一月，柳仲郢调赴京职，李商隐随之返京，结束了5年的东川幕府生活。回京后，被柳仲郢奏举为盐铁推官。大中十一年（857）因公务出使江浙。十二年（858）春夏落职，回洛阳旧居。不久，举家迁还故乡郑州，就在这年的寒冬岁暮时节，一代诗人，在穷愁潦倒中逝世了，年仅46。晚唐诗人崔珣《哭李商隐》诗云：“虚负凌云万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开。”可谓深知李商隐，是对他一生完整而恰当的定评。

与唐代许多杰出作家比较，李商隐更生不逢时。他在短短46年的一生中，竟经历了从宪宗到宣宗6个王朝。帝位如走马灯似的更迭，一个比一个更昏庸腐败，使已呈衰败之势的晚唐，向更加衰败的方面下滑。藩镇跋扈割据，宦官专横乱政，朝臣党争不止，致使长年战乱不已，民生日益凋蔽。晚唐社会的败象颓势，已不是人力所能挽救的了。所以那个时代的诗人，绝大多数人的作品基调是哀叹与悲伤，但不是前辈诗人那种盛世的哀伤。李商隐诗歌中的深曲晦涩，带有浓厚忧愤感伤的情调，就是那个没落时代的时代印记。

李商隐继承我国古代儒学的优良传统，关心国事政事，维护国家统一，反对割据分裂，维护皇权的尊严，反对宦官专权乱政，同情民生疾苦，反对忧民害民，等等。值得指出的是，李商隐这种鲜明而积极的政治态度，与其一生相始终，其间虽因个人不幸或挫折而有强弱之分，但其基本态度却从未改变。这种情况，从李商隐大量的咏史和感怀诗中随处可见。李商隐是个明辨是非，性格耿介的正直诗人。对统治集团内部乱政擅权、排除异己等种种倒行逆施，他深恶痛绝，他用含蓄而精切、

委婉而深沉的笔调，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挹伐。李商隐又是感情丰富、真挚、细腻的诗入。对亲人、对朋友一往情深，百代而下，人们从他那颗明净纯洁的心灵中仍能享受到一种爱与美的熏陶，特别是他那些以《无题》诗形式出现的爱情诗，更著称于世。

李商隐一生的创作，从一个侧面，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已趋没落的晚唐社会。

清人沈德潜在《唐诗别裁》中说：“义山长于讽谕，工于征引，唐人中另开一境。”李商隐确实在“唐人中另开一境”，不过这“另开一境”，不仅仅在讽谕和征引上，更体现在李商隐诗的全部艺术创造上。他的诗，大大丰富了唐代诗歌的艺术成就。他的诗，既有晚唐诗的一般特征，又有其独具的艺术个性，而且这艺术个性又是那么鲜明、突出，并富有创造性，给人以“顿挫曲折，有声有色，有情有味”（何焯语）的感觉。简言之，有如下数点：

第一，婉曲、含蓄的表现手法

李商隐的诗，大都婉曲、含蓄。婉曲、含蓄是他的诗歌重要艺术特征之一。在他早期诗歌创作中偶或使用此法写诗，中年以后便经常使用了，这是他在诗歌创作方法上的创造。这样就使他的诗，与中唐以来诗歌创作中即事名篇，即对生活的直接反映与描写有了区别，又使自己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。对李商隐诗的这一艺术特征，冯浩在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中即已指出，说他的诗“总因不肯直叙，易令人迷”。如《过郑广文旧居》诗：“宋玉平生恨有余，远循三楚吊三闾。可怜留着临江宅，异代应教庾信居。”《笺注》云：“即后人复哀后人意，那转婉曲，

遂令人迷。”不是一目了然，而要几经转折才能明白诗意，就是动用了这样的艺术手法的结果。像这首诗这样的情形在李商隐诗中俯拾即是。作为一种艺术品格、艺术境界或艺术手法的含蓄，也是李商隐诗中所经常使用的。它辞约义丰，味在言外。李商隐的诗，能把人带入一种扑朔迷离的境界，给人以朦胧的美感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多用含蓄的方法。婉曲、含蓄，使李商隐的诗，诗意朦胧迷离，而又寓意深切。但是用得过分，又使诗意晦涩难明，他的《无题》诗，就是这两种情况都能体现的诗篇。

第二，巧用比兴、象征

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传统手法。比，就是比方，以具体事物比抽象情思，以客观景物比主观感受；兴，就是联想，由外界景物触发内心感慨。所谓象征，指借外界有形的事物来表现内心抽象的、主观的情绪。李商隐常用这两种方法写诗，而且用得极活极巧。在李商隐的诗中，经常展现出丰富的联想，他把古代历史、神话传说以及自然景物等多种不相关连的东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，又与现实生活勾连起来，从而创造出一系列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，用这些艺术形象来衬托、比喻、暗示或象征自己的某种深意。这就形成了李商隐诗情深绮思、婉曲缠绵而又寄意遥深的艺术风格。最能代表这种艺术风格的当然又是他的《无题》诗。《无题》诗，不少是借写物以寓人，写此人此事而寓他人他事的。李商隐还常用比较细小的景物，如花、柳、蜂、蝶、蝉、泪等，来寄寓较为远大的意思，对“托芳草以怨王孙，借美人以喻君子”的艺术传统作了新发展新开拓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。

第三，华美多变的语言与别出新意的用典

语言在诗歌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。唐诗的成就，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诗歌语言的成就。唐诗中大家的作品，无一不既畅晓又丰富，既易懂又意深，是深入浅出有机结合的典范。唐诗中也有另一种情形，形象感染力很强，也灵活生动，就是艰深难解，如李贺与李商隐的某些诗。有人说是由语言朦胧造成的，所以虽“深入”，但不“浅出”。李商隐诗确是朦胧，但只是境界朦胧、情思朦胧，语言并不朦胧。他诗中的语言，包括那些最难索解的《无题》诗的语言，都相当清晰、畅晓，只是一串连起来，便使人探之茫茫，索之渺渺了。李商隐诗的语言与唐代许多名家一样，是凝炼、丰富、生动、准确的，但更有其独自的特点，这就是词彩艳丽华美与句式的错综多变。李商隐诗的语言，前人以“百宝流苏”来形容，即词藻丰富、色彩艳丽，给人以绮丽典雅之感。李商隐诗句式灵巧多变，更能显出他使用语言的精细与专注。叠字、叠句、虚词和关联词等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灵巧安排的，从而形成诗歌语言的宛转流动和意境的“深情绵邈”。

李商隐是唐代诗人中用典最多的诗人之一，喜用和善用典故，已成为他诗歌艺术和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。“义山诗好积故实……一篇中用事十七八。”（《碧溪诗话》）朱鹤龄说他的艺术风格“沉博绝丽”，“沉博”，就包括隶事用典这个因素。借助古代历史故事、历史人物、神话传说来表现现实生活，已成了李商隐诗歌创作的重要手段。他常常把复杂的、不便明言的思想感情，借典故出之，能给人以多种联想，并有比喻和暗示等作用。他依据不同的题材灵活用典，或明用，或暗用，或正

用，或反用，大都用得精当、妥贴。这样就使他的诗，诗意更浓，构思更精，表现力更强，并能给人以朦胧美感。但是由于有的诗用典过多，生僻，如同增添了层层薄纱，使诗意晦涩难明，这又是它的不足。

第四，《无题》诗的创作

所谓《无题》，就是“不能以题尽之”的诗体，是李商隐的创造。《无题》诗，不仅是诗体问题，更是李商隐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。有人统计，一部《李义山诗集》，有近20首标作《无题》的诗，加上那些用篇首或句中的二字、三字为题的诗，如《锦瑟》、《碧城》等，以及“有感”、“漫成”之类，实际也是无题的诗，总共近六七十首，在李商隐六百余首诗中，数量已相当可观。《无题》诗，即是借写物而寓人，写此人此事而寓他人他事，有所寄托，这层意思，在李商隐自己的诗文中和历来的评论家都有所透露。李商隐说：“楚雨含情皆有托。”（《梓州罢吟》）有的评论说是“感时伤事”，“颇得风人之旨”（《四库全书·提要》）；有的说“寄遥情于婉变，结深怨于寒修”（朱鹤龄语）；有的说“自来解《无题》诸诗者，或谓其皆属寓言，或谓其尽赋本事，各有偏见，互持莫决。余细读全集，乃知实有寄托者多，直作艳情者少。夹杂不分，令人迷乱耳”（冯浩语）。由此可见，《无题》诗使人们既爱之，而又苦于不得其解，于是把它说成“忠愤”的寄托。不可否认，其中确有寄托之作，但比较多的还是没有寄托的爱情诗。《无题》诗，大多托意空灵，兴寄深微，情思朦胧，境界朦胧，最足以代表李商隐的艺术风格。

李商隐的诗歌对后代影响虽然不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那样大那样深，但从宋代以来，直到清代都有人承传李商隐的绮